

《说倭传》史料来源及作者考辨*

许 军

出版于1897年的《说倭传》是最早全面描写甲午战争的时事小说。学界对《说倭传》的兴趣,主要是由资料来源引发的,即小说中的《中日议和纪略》是通过何种渠道获得的。由此,小说的作者身份、政治意图也被关注。

日本竹村则行教授是最早系统研究《说倭传》的当代学者。他偶得《说倭传》,对小说中的《中日议和纪略》产生兴趣,考证出《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》38卷2993号档案题下注曰:“又与伊藤五次会议问答节略共订为一本,内多辩论紧要语”,但该问答节略只注“原阙”二字;后经多方查找,他发现清廷所失官简却见存于日本内阁文库中,其中“辩论紧要语”竟然与《说倭传》中的记载完全一致。竹村则行据此认为,《说倭传》具有记载原始史料的价值^①。中国学者大多认可这一说法。骆玉明提出:“马关会谈纪要是重要的官方文书,它怎么会仅在两年之后就被全文刊载于‘洪兴全’的小说《说倭传》中,又怎么会在档案中消失,结果被收藏于日本的内阁文库?……《说倭传》的作者‘洪兴全’虽不知为何许人,但小说的立场,除了表达甲午战争后国内日益高涨的爱国激情,也有为李鸿章辩护的意图,他多少应与李鸿章一派人有些关系。”^②陈书良也认为:“‘洪兴全’不顾小说的体裁、风格,硬是将《中日和谈纪略》全文公开在《说倭传》中,借以反映马关谈判的艰难过程和李鸿章的顽强姿态,用心可谓良苦矣!”^③在此基础上,王永健先生提出,洪兴全可能为李鸿章幕僚,受李鸿章指使而创作^④。这些分析议论深刻,给笔者启发很大。

然而,1897年《说倭传》问世时,时事小说尚处于起步状态,李鸿章及其幕僚是否愿意通过一部小说表达自己的反抗声音。2011年7月笔者得到王永健

*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“清末民初时事小说研究”(11YJC751098)阶段性成果。

①[日]竹村则行整理:《说倭传》,日本福冈花书院,2000年。

②骆玉明:《春帆楼、〈说倭传〉及其他》,《文汇报》2011年4月11日。

③陈书良:《遗落的官简——读〈说倭传〉》,《书屋》2006年第2期,第53-55页。

④王永健:《〈说倭传〉平议》,《明清小说研究》2011年第2期,第250-256页。

先生慷慨帮助,得以一睹《说倭传》真容。从而发现,《说倭传》中的史料来自当时公开发行的传教士报纸,并非有其他特殊的上层渠道。

一、《万国公报》的影响

《万国公报》报道甲午战争,始于光绪二十年六月(1894年7月)第66卷。其“朝鲜纪乱”,分析日本出兵有五大原因,并捕捉到李鸿章和战两难的窘境:“李傅相时正大阅海军,闻警回津,先派精兵四千名,分登海晏、海定、图南、拱北四轮船,直往朝鲜以靖乱。……然敬闻皇上以皇太后本年六旬万寿,有罪者尚应肆赦,无辜赤子岂忍迫诸锋镝之中。……傅相钧令,各兵无入汉城,将请英、德两国公评中日之曲直,慎勿轻启衅端。”其对战争形势的把握非常敏锐,从一开始就超过晚清士人的军事判断。

从66卷到86卷(1896年3月),《万国公报》对甲午战争的全程报道主要分为四个部分:朝鲜战乱,包括15篇系列评述;中日战争,涉及各类电报、文牒、消息、评论;中日议和,包括五次“问答节略”,以及为李鸿章辩解的《辩忠篇》和《序》;台湾战争,主要是零散的电文、消息,以及一篇《台湾归东》的评述。

针对李鸿章遭到的舆论谴责,《万国公报》为其作了系列辩解。这些辩解都从形势与事实出发,多方面、多角度展开,而且立论公允。如78卷林乐知、蔡紫绂合著的《美国福世德国务卿语录》,以主客问答形式,分析晚清局势,为李鸿章辩护。第79卷“第五次问答节略”之后,附有编辑评语:

统观问答节略五篇及往还公牍十餘篇,知中日和款至得以就此定局者,使相实已舌敝唇焦、毫枯腕脱,迨图穷而匕首现。……战祸既平,窃冀中国深维致败之故,幡然尽变昔年仇视外人之私见,而有言责诸臣更不可抹倒时势,以抨弹沽直名。因录全文,附玆数语。若第曰为使相辨诬也,抑未明本馆慎持清议之微意矣。

其后,有雷溪樗叟序、林乐知撰的《辩忠篇》,呼吁满清人士“真忠爱国,拨乱反正”。

由于甲午战争系列报道的巨大影响,在《万国公报》之后,出现了两类后续作品:

其一,辑录。

甲午战争的惨烈结果震惊时人,时事报道本身出现较大的阅读市场,而持续广泛的阅读期待随之产生,编辑战纪有了发售谋利的空间。光绪二十一年十月(1895),林乐知意识到甲午战纪辑录成书的重要性。在82卷31页中,他以光学会同志的名义,刊登“新著《中东战纪本末》豫启”,表达了这一设想。此后,他连续登载广告称:因为《万国公报》的报道客观全面,“远近之来补购者,尚复几无虚日。本会虑无以副雅意,爰取去秋至今,关系战事诸文,逐一润色,并增著善后各要策,汇为一书,名曰《中东战纪本末》。其命意之所在,务欲振

兴中国”。该书于1896年5月问世。

《中东战纪本末》问世后,又启发了王炳耀编撰《中日战辑》。该书附录有《简大狮惨死愤言》,由简大狮死于光绪二十六年(1900)三月二十二日,可知该书实际成书不会早于1900年。《中日战辑·序》所做的时事评论,都是《万国公报》的陈语。不过,其《序》倒是坦承了材料来源:

《万国公报》所载战事始末,最真且切;次则《华字日报》。兹将《公报》登录战务编辑成书者十之九,采自他报者十之一,颜曰:“中日战辑”。皆美国进士林君乐知、我国才士蔡君紫绂等数先生月登《公报》之雄词伟论;自无功焉。

将该书所辑录各则材料与两份报纸核对,可见辑录比例正如《序》言。《序》又说:

望读者饮水思源,毋忘《公报》惠我中国之苦心,兴我中国之热志!余虑读报者久而渐忘,特辑成书,助其疾声长呼,使人常醒;从此鉴前车、绸未雨,励精图治,发奋为雄:此即辑是书之本意。

王炳耀“久而渐忘”的担心并非多馀:就笔者目力所及,今日研究者未见有人提及《万国公报》中的“五次问答节略”。《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》、《台湾文献丛刊》交代其出处都注“未详”。由此足以看出,《中日战辑》将《万国公报》的相关文字辑集成册,对于集中报道甲午战事、推动学习西方的维新思潮也发挥了一定作用。此外,附录中的《答客问刘大将军事》、《简大狮惨死愤言》等文字,已经开始较为集中地谴责晚清政治腐败,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潮的急剧变化。

其二,著述。

1900年初,李鸿章赴任两广总督,奉命缉捕维新人士,被保皇势力视为绊脚石。梁启超曾多方搜罗刺客,欲杀之而后快。然而,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既望(1901年12月26日),在李鸿章死(1901年11月7日)后不到两个月,梁启超著成《李鸿章传》^①。该作雄视百代、纵横中外,高度评价李鸿章,鼓吹变法维新思想。其对李鸿章的评价,与《万国公报》颇多共通之处。

在梁启超发起小说革命之前,小说在晚清并不为人重视。中国古典小说的近代转型,首先是思想的近代转型。兹将《说倭传》、《李鸿章传》中的相关文字与《万国公报》做一对比,以探究中国古典小说与维新思想家对同一历史事件报导的兴趣差异,由此亦可发现《万国公报》对它们的笼罩程度。

^①梁启超:《李鸿章传》,江西人民出版社,2003年。

		万国公报	说倭传	李鸿章传
总评	毁誉	155 册 1 页:奕奕彻候,竹帛留芳。……灵之来兮,无忧谣詠。	未及	1 页:有人于此,誉之者千万,而毁之者亦千万。誉之者达其极点,毁之者亦达其极点。
	地位	78 册 2 页:夫以中国之大,华民之众,而仅有一人通达权变之中堂,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,……	未及; 其再版本《绘像中东大战演义》,李鸿章人物画,注曰:天下第一位大臣。	130 页: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;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。
	柱石	76 卷 26-27 页:西人“恐中国有复仇之意”,于是讯问日本某爵臣。爵臣回答说,日本根本不怕中国复仇,因为中国虽大,却一盘散沙;中国虽富,却上下乖隔;中国虽众,却众心涣散。 ……吾知李中堂和局已成之后,必急起而图之。然中堂老矣,继其志而成其事者,吾未知其谁属也。	23 回:西人“恐中国有复仇之意”,于是讯问日本某爵臣。爵臣回答说,日本根本不怕中国复仇,因为中国虽大,却一盘散沙;中国虽富,却上下乖隔;中国虽众,却众心涣散。 ……吾知李中堂和局已成之后,必急起而图之。然中堂老矣,继其志而成其事者,吾未知其谁属也。	3 页:外国论者,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。又曰:李之死也,于中国今后之全局,必有所大变动。…… 要之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,如虎之失其伥,瞽之失其相,前途岌岌,愈益多事。
战败	事权	74 卷 32 页:李傅相……力主和议,乃某大臣尚欲沮挠。恭亲王袖出奏启各件示之,并剖切言之曰:“吾之所以不克遽与者,并非李某之咎也;李某之意,具见此数纸中,而有人再四阻之,故其咎实在吾辈。目前挫失,亦惟吾辈之罪。”	未及	12 页: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,李鸿章一人不足惜,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,而我四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,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。
	将领	79 卷 1 页:广丙舰管带某以粤洋舰队无豫北洋为藉口,殷殷向日将乞怜,万国哗传,引为笑柄。	《序》:刘公岛献船之丑	72 页:刘公岛降舰之役,当事者致书日本,求放还广丙一舰,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,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。

议和	条款	78 页 4 页：今将约稿大意，合为四大端，以免逐条应对之烦。所谓四端者，即：一，朝鲜自主；二，让地；三，兵费；四，通商权利。	20 回：伊云，只赔款、让地与占守地方三节译有华文。李阅后云，即以此已译三端开议。	77 页：分四款：一、朝鲜自主；二、让地；三、兵费；四、通商权利。除第一朝鲜自主外，余皆极力驳议。
	停战	见问答节略（略）	20 回：李云：现在日军并未至大沽、天津、山海关等处，何以所拟停战条款内竟欲占据？…… 伊云，惟本大臣不愿贵大臣已将停战之议搁起，于议和时又复提及。李云，和款一定，战即不议自停。	76 页：首议停战条件。日本首提议以大沽、天津、山海关三处为质。辩论移时，不肯少让。乃更议暂搁停战之议，即便议和。伊藤言：“既若尔，则须将停战之节略撤回，以后不许再提及。”彼此磋商未决。
	城下	见问答节略（略）	21 回：李云：不许我驳否？伊云：驳只管驳，但我主意不能稍改。 李云：如此狠凶条款，签押又必受骂，奈何？	82 页：当戎马压境之际，为忍气吞声之言，旁观犹为酸心，况鸿章身历其境者！……舍卑词乞怜之外，更有何术！

由上表，可以看出以下数点：

其一，两部作品在思想基调、情节铺排，乃至在命题上都受到《万国公报》的直接规范，在众多细节方面甚至达到亦步亦趋的程度。这是晚清西风强劲的一个突出例子。《说倭传》的问世比《李鸿章传》整整早 4 年，联系到李鸿章当时投闲置散、悲忧莫名的政治处境，这部小说对李鸿章的鼓吹不仅大胆而且及时，乃至学界认为其有意为李鸿章辩冤。足见时事小说的政治敏感，并不比当时思想界来得迟缓。

其二，《万国公报》的报道相对全面，虽然极力宣传李鸿章变法维新的正面形象，但对李鸿章的抨击言辞也未予屏蔽。小说追求大众口味，努力回避这些争议热点，而《李鸿章传》偏要以豪放语言突出强调之，显示了梁启超文章横议风生的辩士风格。

其三，《万国公报》抨击刘永福不识时务，有重新燃烧东方战火的危险。《李鸿章传》将其视为与传主无关加以省略。《说倭传》偏能反其道而行，极力鼓吹刘永福违旨、守台、抗日的英雄业绩，并将刘永福返回大陆的行为描写成失败犹荣、忧国老死的悲剧。梁启超的忽略，可以看出他对这种自下而上的暴力行为保持着距离，他的思想仍未脱离上层路线。

二、《说倭传》以《万国公报》为成书基础

王永健先生认为,《说倭传》可分为三个部分:“1-18回写中日甲午战争的缘由、经过和结局;19-21回写马关中日和议历程和结局;22-33回写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的干涉和台湾人民反日本割占的抗争。”^①兹遵从其说,将小说文字与《万国公报》详细对照,探究小说受到的切实影响,论述如下。

第一部分甲午战败。小说认为,各方合力打破了李鸿章的既定部署,铸成败局。

小说所载李鸿章主和的战略决策,来自《万国公报》。第三回载,倭国向清廷索要人韩平匪兵费五十万两,李鸿章建议忍耐一时,徐图后举。李鸿章的“五不宜战”,语出《万国公报》71卷第22-23页:“中国之所以败于日本者,一在兵多而不精;一在势分而不合;一在权杂而不专;一在倒执而不化;一在事虚而不实”;而小说列举的具体理由散见于《万国公报》的历次评论,无一缺漏,唯文字稍有区别。廷臣主战,皇上怒战,可见《万国公报》68期24页:“廷臣之主战者,封章前后数十上。……圣怒正盛,日兵若不撤退,天讨决不能稽。”小说关于甲午战争种种乱象的纲领性论述,来自于对《万国公报》相关报道的认真整理。

小说所载上层内耗,来自《万国公报》。小说载,战败后,翁同龢反对议和,建议迁都,朝内众臣、慈禧、光绪、亲王皆“无主意”、“无定见”。对于这一短视的鸵鸟思维,李鸿章强烈反对。翁同龢迁都建议可见《万国公报》72卷20页:“《字林西报》有云:有自燕京来者,谓当敌氛日迫之际,翁叔平、李兰荪两尚书,合词奏请……西狩。文芸阁著作郎廷式亦以为言。”其建议被“上谕”否决。小说为突出李鸿章中流砥柱的作用,将否决移植到李鸿章身上,并为其设想了一段反驳文词。

小说于众多朝臣之中,唯独痛斥翁同龢,这也是受报纸影响。《万国公报》第74卷32页载,李鸿章多次请求加强军备,翁同龢处处掣肘。某御史弹劾翁同龢误国,“今乃共责李鸿章,臣窃冤之”。

小说抨击文字,也受《万国公报》的启发。《序》中所谓“天妆台畏敌之羞,刘公岛献船之丑,马关订约,台、澎割地”,其中论而未述的文字也都可以从《万国公报》中找到根据。比如“献船之丑”,小说载,伊东佑亨先发劝降信,然后丁汝昌“被迫”同意:

即命广丙管驾张璧光乘坐镇北小舰,竖白旗,赍(降书)往倭军。伊东立即复函许可,并将香宾酒、蜆黄等三件馈送丁禹昌。

《万国公报》之报道则令人切齿。74卷26页载:

遣广丙管驾张璧光乘坐镇北小舰,高揭白徽,直造日提督伊东佑亨之

^①王永健:《〈说倭传〉平议》,《明清小说研究》2011年第2期,第252页。

座船投递降书。伊东佑亨急会诸将商议,并派四舰扼守西口,以防华舰乘机逸出。旋请张君入客舱。张君身穿行装,口操英语。叙座既定,伊东佑亨略与寒暄,因问丁提督安否?曰:病间。刘总兵安否?曰:安。食足乎?曰:米与鸡、葡、笋、菜俱有。问牙山之役,方伯谦甚谙海战,何故杀之?曰:上命也;丁公殊不愿。问威海何易失也?曰:陆军与水师不相顾也,又无纪律,诸事皆然,此总署之咎也;再战徒伤生命,恐无济于事矣。问刘公岛近况如何?曰:官眷及有财者皆去矣,穷民不能去,受贵军中炸弹,其苦实深。伊东旋畀以覆书及香槟酒等物。

关于这位张璧光,第79卷1页又载:“广丙舰管带某以粤洋舰队无豫北洋为藉口,殷殷向日将乞怜,万国哗传,引为笑柄。”丁汝昌献船,并非弹尽粮绝,而是众将领贪生怕死,令这位傀儡主将大发妇人之仁;张璧光乞降,更是毫无廉耻。诚如小说所谓“若尽将其详而遍载之,则国人必以我为受敌人之贿,以扬中国之耻。”

第二部分马关谈判。艰苦危险的谈判过程,显示了李鸿章为国操劳、鞠躬尽瘁的精神。而谈判过程的详尽材料,皆来自《万国公报》。

为了突出李鸿章赴日谈判的辛苦操持,小说直接抄录《中日议和纪略》,构成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回。这三回文字,占全书篇幅近三分之一。议和中,倭人狼子野心,令人愤恨;而李鸿章忍辱争利,令人同情。详尽繁琐的文字记述,寸利必争的反复争辩,足以证明李鸿章不是卖国贼,而是令人尊敬的弱国贤相。

《中日议和纪略》,详载于《万国公报》,题曰“问答节略”。第一、二、三次问答节略分别载于77卷第23-24、24-25、25-26页;第四、五次问答节略分别载于79卷第7-9、9-13页。其文字与小说完全相同。

关于日本刺客小山行刺李鸿章情节,在《万国公报》中有多次报道。第86卷第2页甚至转载了京师刊本《使相被刺纪实》,足见这一时事为时人熟知的程度。小说对这段文字,以寥寥数语简略带过。因此,清廷没有保存这份谈判实录,可能不是一种有意销毁,大概因为其载在报章,又传入小说,因而家喻户晓,似无转录必要了。

小说不仅完全抄录了五次问答节略,连和约草稿甚至国内的舆情反映及报纸评论也照录不误。小说二十一回载“该约既呈皇上御览之后,皇上命枢臣会议”,于是朝野纷纷抗议,小说评论道:“中堂订立此约,苦心孤诣,本系无可奈何之事,国人不谅苦衷,交章论奏。又有俄、德、法公使为梗,几至中变。皇上特命刘岷庄钦使、王夔石制军悉心会议,两帅夤夜参酌,联衔覆奏,由是盖用御宝,和局遂成。”这段文字,完全抄录自《万国公报》76卷26页。

第三部分刘永福抗日。但对刘永福抗日行为,小说与报纸的立论出现分歧。小说歌颂刘永福为民族英雄,而报纸则时有谴责刘永福抗旨害民的文字。如第80卷21-24页《新语八》中,讽刺台湾以一隅之偏抵抗日本,犹如以卵击石;对刘永福违背和约、违背圣旨的抵抗行为语含贬斥,并说“今有绘为图画,

编成书册者,袭野史稗官之窠臼,添蛇神牛鬼之荒唐,……甚至贤妻娇女,尽列行间;臧获系囚,悉谱战事。在若辈或仅弋利起见,而不知适以厚诬乎军门,于事已属大谬。”第82卷27页《台湾归东》,又讽刺刘永福沽名钓誉,投降日本不成,回国冒充英雄,跋扈飞扬,下场可耻。这些文字,暴露出传教士报纸维护皇家权威、害怕民间反抗、力保在华利益的西方面目。

小说对刘永福的处理,既受当时刘大将军系列小说的影响,也受到《万国公报》80卷18页汉纳根语录的影响:“中国取败之道有二大端,一曰无总帅,督抚各自保封疆,分而不能合;一曰无名将,提镇各未谙韬略,愚而不能明。职此二端,断难一战!”小说以此命意,突出李鸿章就是满清反抗外来入侵的“总帅”,而刘永福就是“名将”,大清帝国只要事权专一,完全可以一战。

因此,这三部分的内容安排,始终围绕着李鸿章这个中心人物:第二部分写李鸿章赴日议和,忍辱负重、寸利必争,即便毁誉杀身也泰然自若的宰相气度,固然是小说要表现的核心;第一部分、第三部分也是为了表现李鸿章的远见卓识。在《万国公报》看来,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是西学东渐最为杰出的成果,李鸿章本人是当时唯一推行西学的权臣。小说以《万国公报》为基础,自然给人为其辩诬的印象。但小说选择李鸿章,最大目的却在帝国复兴。

三、洪兴全似伪托干王之子

既然《中日议和纪略》来源于《万国公报》,则上文诸家以其特殊来源推论作者身份的说法,显然存在疏漏。笔者认为,《说倭传》作者为干王之子的说法似为伪托。

《说倭传》作者署名为洪兴全子式。阿英认为:“兴全为太平天国洪仁玕之子,结束处竟有拥清之嫌,很出意外。”^①但这一说法未提出处。柳存仁对此怀疑:“有署洪兴全字子式的序文,惟正文又作‘兴全刘子式辑’,则撰人的姓氏也成问题。”^②同时问世的《磷血丛钞》卷四曾载“伪干王子静宜草堂主人,著有《新说》二册”,并大段引用据说是该书材料^③。史式曾专门考证该部分文字完全作伪,根本不可能出自干王之子^④。笔者认为,兴全为干王之子一说,情况可能与此相类。

《洪氏宗谱》记载如下:“仁玕,名谦益,号吉甫,名扬五子。……配,胡氏,早卒;张氏,生子:葵秀,蓉秀,兰秀。”“葵元,名葵秀,仁玕之子,道光丁未年十月十八日寅时,出外洋。兰元,名兰秀,仁玕之子,咸丰丙辰年五月初九午

①阿英:《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》,中华书局,1958年,第14页。

②柳存仁:《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》,书目文献出版社,1982年,第159页。

③茅家琦: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9年,第413页。

④史式:《〈磷血丛钞〉考伪》,《重庆师范学院学报》(哲社版),1981年第2期,第64-72页。

时。”^①《洪氏宗谱》未提干王另一子蓉秀情况,也未记载葵元、兰元的妻子与儿女情况。《洪氏宗谱》未提及洪兴全二子的任何信息。

简又文《太平天国洪氏遗裔访问记》载:“洪葵元,又名葵秀,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之嫡子。……十四岁即统兵出战。天国垂危时,干王为预防不测,保存嗣续计,求天王许葵元将兵出天京,以备失败后易于逃亡也。天京破后,天国瓦解,葵元弃其军,孑身策马亡命。至闽,马毙;葵元乃徒步南行,沿途乞食糊口,展转流离,始得返至粤境。”葵元先为人养鸭为生;后因暴露行踪,地方官追查,得德国巴色会牧师帮助,入李朗书院读书。其后清廷追捕甚急,葵元携眷逃亡美洲,在哥朗埠授徒为业。妻死,葵元续娶黑人妇女,又生一子。有一子开汽车行为生。“前时尚有信回香港族人处,……惟近年则音问不通矣。”^②简又文寻访干王后裔情况,未提到干王其余二子。

据洪仁玕亲书自述:“娶妻张氏,生有三子,长子桂元,年十四岁;次子兰元,年九岁;三子芝元,去年生的。”^③供词中长子的名字与年龄皆有误。葵元生于1847年,天京城破、洪仁玕被捉都在1864年,则葵元应为十七足岁。幼天王洪天贵福的供词亦可佐证:“年十六岁”;“干王洪仁玕……有三四个儿子,一名葵元,长我二三岁。”^④笔者认为,大概因为其馀二子困在天京,已经生死难料,洪仁玕遂故意将长子信息写错,以掩护葵元逃亡。

据此,洪仁玕共有三子,洪葵元生平清晰,其馀二子在天京城破后生死不明。1897年,葵元身在美洲,绝无可能在香港出版一部时事小说。若洪兴全真为干王之子,大概不会给双手沾满父兄鲜血的李鸿章唱赞歌。玕王洪春魁(先改名洪和,后改名洪全福)就曾出于单纯的反清目的,积极参加孙中山的革命活动。加上小说材料来自当时公开出版的著名报刊,而阅读小说在晚清为社会上层所忌讳,因此作者与李鸿章有着特殊联系的可能不大。所以,洪兴全子式为干王之子似为伪托或者谣传。

作者工作单位:上海对外贸易大学人文社科部

①陈周棠校补:《洪氏宗谱》,浙江人民出版社,1982年,第73-74、87页。

②简又文:《太平天国杂记》,上海商务印书馆,民国24年(1935),第232-233页。

③《近代史资料》总92号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7年,第79页。

④《近代史资料》总92号,第101页。